

纳西族的渊源、迁徙和分布

方国瑜 和志武

近代纳西族居住在祖国西南金沙江上游地带，略以长江第一湾流至东经一百度四分处，自北而南，分作东西两个区域。这两个区域的纳西族约三十万，称谓复杂，一般说来，东部称为“么些”，西部称为“纳西”，见于史籍记录，则通称“么些”，现已确定“纳西”为共同的族名。从本族自称来说，西部自称 naŋqi-，东部自称 naŋ 或 na-ɬzɬ-。按：qi- 和 zɬ- 之意为“人”或“族”，而以 naŋ 为专名，naŋ 的取意为“大”^①，名从其主，称为 naŋqi- “纳西”是正确的。至于么些为他称，见于记录无定字，同音异写，且含有侮蔑，应当废除。兹述历史，征引见于记录的名称，仍旧其文，并不是认为这样的称谓是正确的。

纳西族渊源于远古时期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带的羌人，向南迁徙至岷江上游，又西南至雅砻江流域，又西迁至金沙江上游西地地带。在漫长时期，劳动人民不断创造经济和文化，经过历史发展各个阶段，成为缔造祖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成员之一。其渊源、迁徙和分布，见于记录可考者略说之。

一、古羌人支系

《说文解字》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从羊、从人”。《礼记》王制篇：“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按：古时居住在西北草地的羌人，以游牧为主，部落分居，有“五戎”、“七戎”之称，（《尔雅》释地）先后向东、西、南三面迁徙，渐迁而远，分在各地创造了历史。其向东迁徙者，如“夏”部族内有羌人，《史记》六国表载：“禹兴于西羌”，《集解》引《帝王世纪》“禹生于西羌，西夷人也”。又“商”部族邻近有羌人，《诗》商颂殷武篇载：“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甲骨刻辞有羌方部落（北羌、马羌），又有伐羌、往羌、获羌、来羌、用羌之事，为商之一部。又“周”部族亦有羌人，《诗》大雅生民篇载：“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后汉书》西羌传：“西羌，姜姓之别也”。按：“之”字应作“其”，姜为羌之别姓，有称“姜戎”（《左》襄十四年），其齐、许、申、吕诸国皆姜姓。大抵夏商周三代，羌人东迁，散居于黄河中游地带，名号甚多，渐与当地居民融合，后为形成“汉族”之成员。其向西迁徙者，《后汉书》西羌传载：“附落南出赐支（《禹贡》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又载：“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新唐书》吐蕃传载：“吐蕃本西羌属，有发羌、唐旄等，居析支水西”。诸羌分居，名号甚多，传说古史有戎、羌、堆、博诸部，后以博为中心（发、伯特），融合形成“藏

^① naŋ “纳”在口语中取意为“大”，如：bi-ŋ naŋ 大森林；huɿ-ŋ naŋ 大海；lɿ-ŋ naŋ 大石；dzy-ŋ nqɿ 大山；huɿ-ŋ naŋ 大雨等。纳西口语，naŋ 的普通意思还有“黑”之意，但 naŋ qi- 不是“黑人”之意，“黑人”应为 qi-ŋ naŋ，修饰语在被修饰语之后。

族”之先民。其向南迁至蜀汉近境岷江流域分支而南者，为西南各族之先民，支别甚多，纳西族即其一支(说在下文)。

见于记录之羌人支派，各为族别，而语言有相同特征，据调查近代各族语言，从语音、语词、语法，分析综合研究其亲属关系，所得结论，有汉藏语系，分汉语、苗瑶语、壮傣语、藏彝语四个语族。其藏彝语族，分藏语、彝语、景颇语等三个语支；又彝语支分彝语、纳西语、傈僳语、拉祜语、哈尼语、白语等语言。各族语言都是历史形成的，语言之亲疏关系，可知其族属渊源关系。纳西族传说汉、藏、纳西三族的祖先为三兄弟，即因其族属渊源有关，且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友好往还，相互影响，亦有迁徙融合，故传说如此也。

南迁羌人之纳西族先民，所居住的地域、年代及社会生活，见于记载者，虽不详而大概可知，分说如下。

二、旄牛道的越嵩羌

纳西族渊源于自河湟地带南迁的古羌人。《后汉书》西羌传载：古羌人“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嵩羌是也”。又说：“牦牛羌在蜀汉，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也”。按：所谓牦牛羌，散居在祖国西南蜀郡边境广大地区，支别名号很多，么些族是其中之一支。章太炎《西南属夷小记》载：“唐时所谓么些蛮，即羌种之流入者”，这是可以确定的。

《史记》西南夷传载：汉初的蜀贾人，“取犏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按：“髦”即“牦”，以产牛著，与蜀地经济联系很密切，为蜀郡边境的部族。《后汉书》西南夷犏都传载：“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年)以为沈黎郡，天汉四年(公元前九七年)并蜀〔郡〕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按：“旄”亦即“牦”，以旄牛为地名；《水经》若水注载：“大渡出徼外，至旄牛道”，则旄牛在大渡河上游今泸定地区，而青衣在今雅安地区。《犏都传》又载：永平中(本纪在永平十七年，公元七四年)旄牛道的白狼、盘木、唐菽等奉贡，献诗三章。这就是所谓“白狼歌”，共四十四句，一百七十六字。从对译的音义来看，用汉语及过于抽象不能确定本义的约八十字，其余九十余字，基本上与近代纳西语相同或相近，语法亦相同，可知白狼语与纳西语的亲属关系是很密切的。从语言的亲属可以推知族属渊源关系是很密切的，纳西族的先民，是从大渡河以北地区迁徙而南。

任乃强《西康图经》民俗篇载：“么些为康、滇间最大民族，亦最优秀之民族也”。又载：“今泸定县南之摩西面，实称摩西面，谓摩西古境也”，不知这个地名是否很早时期已有，若然，则大渡河北旄牛族地区早已有摩西一支的族名。其在大渡河以南者，《元史》地理志建昌路邛部州载：“昔么些蛮居之，后仲由蒙(按：彝族祖先)之裔夺其地”。按：邛部州即今越西县，何时为仲由蒙之裔夺之，不得而知。惟元志阆州曰：“昔仲由蒙之裔孙名科居此，至三十七世孙樊罗内附”，若仲由蒙之裔得邛部地，亦为同时，则么些族在邛部失败，约当公元三世纪末(西晋时期)。由此可知，么些族早年居住在邛部州，后来始衰，但并非完全失败，还在长时期内有些族住在这个地区。《冕宁县志》载清康熙年间，还有些族的土目和土民，这是从很早时期住在大渡河南的么些族。我们在一九六〇年春到冕宁访问，遇西番人宋占胜，据他说：“往昔么些村落，大部现已操汉语，老规矩已不存在”。又听说有一位冕宁么些族干部在西昌专区民委会工作，我们转到西昌时，他去畜牧场，没有见着，

冕宁么些族的情况还弄不清楚。

三、定祚县的摩沙族

么些族居住在大渡河南的年代很久，在早期已有一部分从这地区迁到雅砻江下游一带。《华阳国志》蜀志越嶲郡定祚县载：“县在郡西，渡泸水（按：指东泸，即雅砻江）宾刚微，曰摩沙夷”。按：“曰”字今本作“白”，从《蜀中广记》卷三四引文改正。“摩沙”即么些名称最早的记录。定祚即今盐源县。《华阳国志》又载：张嶷至定祚，“夷帅狼岑、盘木王舅不肯服”。此说已见于《三国志》蜀志张嶷传，称：“定祚豪帅狼岑、盘木王舅，甚为蛮夷所信任”。按：张嶷至定祚，应在延熙三年（公元二四〇年）稍后，狼岑即定祚豪帅，为盘木王之舅，盘木即《后汉书》中之白狼盘木，在旄牛道，与定祚县摩沙夷为姻姻，亦可知摩沙夷与旄牛夷有亲属关系。且疑摩沙之“沙”，即纳西语之 ts'oʃ，意为人或族，摩沙即摩族，以“旄”得名，汉语称之，沿用至近代。

么些族居住在定祚的年代可能很早，据丽江《木氏宦谱》载：摩娑人居定祚，世为昆明总军官，传至唐武德时叶古年凡十七世。若此说可信，则在公元二世纪末，定祚境内已有摩娑土长，与《三国志》所载相合。在这地区的摩娑族，后来繁盛，樊绰《云南志》卷一载：“台登城直西有西望川，行一百五十里入曲罗，泸水从东北来，至曲罗荣回三曲，中间皆磨些部落”。又卷六载：“昆明、双舍至松外以东，近泸水，并磨些蛮种落所居之地”。按：台登城，在今冕宁县南之泸沽镇，直西至西望川，应近雅砻江沿岸，惟不能确指其处。又此泸水，亦称东泸，《樊志》卷一载：“东泸，古诺水也，源出蕃中节度北”，此即今之雅砻江。流至曲罗，不详其处。《水经》若水注引益州记曰：“泸水源出曲罗”，郭允蹈《蜀鉴》卷九转引作“李膺益州记”，则曲罗地名已古，但非在泸水源，戴校《水经注》已疑“有歼误”，盖衍“源”字。又《樊志》卷六载：“昆明城，在东泸之西，正南至松外城”。按：昆明即今盐源县，松外在其南。《新唐书》地理志嶲州昌明县载：“贞观二十二年开松外蛮，置牢州及松外、寻声、林开三县，永徽三年，州废，省三县入昌明”，疑昌明即在今盐边县，寻声即双舍，音读相近。《樊志》载：“东泸流至寻传部落，与磨些江（金沙江）合”，又载：“磨些江至寻传与东泸合”，疑寻传即寻声之误，寻声部落在雅砻江与金沙江会流之处。大抵，今雅砻江下游盐源、盐边两县，唐代为么些族居住之地。

《元史》地理志柏兴府载：“昔摩沙夷所居，汉为定祚县隶越嶲郡，唐立昆明县，天宝末没于吐蕃，后复属南诏，改香城郡，元至元十年，其盐井摩沙酋、罗罗将茹库内附”。按：柏兴府即今盐源、盐边之地，应在元代以前已为摩沙族与罗罗族共居，各有土长。《明史》建昌土司传载：“柏兴府贾哈喇境内么些等部”，又载：“贾哈喇者，么些洞土酋也”。按：《蜀中广记》卷三十四引土夷考、九种夷，有么些族，即在盐井卫。卫属土千户所，有左所千户姓刺，右所姓八，中所姓刺，前所姓阿，后所姓卜，载：“国初归附授官，贡马事例皆同”，是从元代沿袭的土职。

嘉庆《四川通志》卷九十七土司志盐源县、会盐管所属，有左所（喇姓）、右所（八姓）、中所（喇姓）、各为千户，前所（阿姓）、后所（白姓）各为百户，康熙四十九年投诚授职，都说是“么些夷人”，共管一千七百四十五户。此外，还有瓜别安抚司己氏管一千二百五十三户，古柏树千户郎氏管五百八十六户，也说是“么些夷人”。按：瓜别、古柏树在今盐源县西部。

自汉以来,么些族居住在定祚县,后来繁盛,自唐以后罗罗族迁居这个地区,么些族土长已不能统治全境。明代设盐井卫,设置军屯,么些土千户分隶军衙,社会经济文化的改变很剧烈,清时土职虽沿袭至近代,势力已衰。又由于民族融合,么些族人口已少,据近年调查,在盐源、盐边、木里等县的么些族,共一千四百九十七户,一万零八百三十六人。^①

四、西洱河的越析诏

定祚地区的么些族,有渡金沙江而南至洱海以东地区的部落,樊绰《云南志》卷三载:“越析,一诏也,亦谓之磨些诏,部落在宾居,旧越析州也,去囊葱山一日程”。又卷一载:“越析州,今西洱河东一日程,越析州咨长故地也”。又卷二载:“囊葱山,在西洱河东隅,河流俯晒山根,土山无树、石,高不过数十丈,面对宾居、越析,山下有路,从渠敛赵出遣川”。又卷五载:“渠敛赵东北至毛郎川,又东北至宾居,又北至越析州,么些诏故地也”。按《樊志》所载越析诏的地域甚为明白,渠敛赵即赵州,今之凤仪,遣川即遣贖诏,今之邓川;自渠敛赵赴遣川,沿洱海东岸行,过玉岸山,当即囊葱山;距此一日之宾居,今犹用此名,宾居北即宾川县城,越析诏城应在其地,所管为洱海以东地区。惟《元一统志》丽江路建置沿革载:“唐为越析诏,或谓么些诏”,《元史》地理志同(字句稍异),后来编纂史事之书亦同,即以么些族盛于丽江,而作此说,并非有据。

么些族何时迁至越析州,不得而知,惟在开元年间,势力强盛,为六诏之一。后为蒙舍诏所败,《樊志》越析诏载:“有豪族张寻求,白蛮也,开元中(原误作贞元),通诏主波冲之妻,遂阴害波冲,剑南节度巡边至姚州,使召寻求笞杀之,遂移其诸部落,以地并于南诏。波冲兄子于赠,提携家众走,降铎鞘,东北渡泸,邑龙佉沙,方一百二十里,周回石岸,其地总谓之双舍。于赠部落亦名杨堕,居河之东北。后蒙归义隔泸城临逼于赠,再战皆败。长男阁罗凤自请将兵,乃击败杨堕,于赠投泸水死。数月始获其尸,并得铎鞘”。南诏击败越析诏事,亦见《德化碑》载:“越析诏余孽于赠,恃铎鞘,骗泸江,结彼凶渠,扰我边鄙。……诏(阁罗凤)弱冠之年,已负英断,固请自证,志在扫平,臬于赠之头,倾伏藏之穴,铎鞘尽获,宝物并归,解君之忧,静边隅之侵”。按:于赠携家众奔越析州,东北渡泸水,应在开元二十六年之前(是年已平五诏,唐封蒙归义为云南王,见《册府元龟》九六四)。蒙归义乃隔泸水与于赠对峙,于赠复渡泸与南诏战,当因么些部落不是一处全部迁走,

^①盐源地区自古以来的居民,主要是么些族。解放初期的调查资料,也称么些和么梭,不久出现了所谓“蒙族”的称谓,不认为是纳西族。和按:一九五六年,我参加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三工作队纳西语调查组,到四川西昌民族干部学校,找盐源、木里和盐边等县的“蒙族”学员和干部调查语言,经过初步分析研究,证明不是“蒙语”,而是纳西语。一九五七年在昆明召开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时,四川省民委曾派两位代表参加纳西语文讨论,最后通过《纳西语调查报告》,将纳西语正式划分为东、西两个方言,上述盐源、木里、盐边的所谓“蒙语”,属于纳西语东部方言。一九六二年四川省志民族志调查组,关于《盐源、木里“蒙族”识别调查小结》认为:“根据我们访问一九五二年前后在左所和永宁工作过的同志所得材料,改称‘蒙族’是个别上层搞出来的。”他们拟将盐源、木里和宁浪县‘摩梭’改称‘蒙族’,建立至少相当于县一级的自治单位,从而利用各种合法的机会和民间传说,在人民群众中进行活动。”该识别调查小组经过对民族名称、历史、语言文字、经济生活、社会组织 and 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调查和分析研究,认为“盐源、木里‘蒙族’不是蒙古族,而是纳西族的一个支系,应改称纳西族”。我们认为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在越析地区还有势力，企图恢复。既被阁罗凤击败后，南诏不容么些部落，遭到扫荡，都退回泸水以北。阁罗凤出征，应在开元二十八年，盖阁罗凤生于开元九年（《白古通浅述》）是年称弱冠也。

于贍渡泸而北，“邑龙佉沙”，“谓之双舍”，按：《新唐书》南诏传作“邑于龙佉河”，疑“沙”字为误；《樊志》卷七载：“东蛮磨些蛮诸蕃部落，其食龙佉河，水中有盐井两所”，此龙佉河即龙佉河。又双舍即《樊志》卷六所谓“昆明、双舍至松外以东边近泸水”之地，为寻声之转音（已说见上文）。《通典》卷一九九边防典载：贞观二十二年四月，梁建方讨松外诸蛮，“蛮酋双舍帅众拒战，建方击败之”，亦载《新唐书》南蛮传，作“酋帅双舍”，以双舍为人名，疑“蛮酋双舍”，或即“双舍蛮酋”之误，也可能同用为地名和人名。从记载可知，双舍在今盐边县境，而龙佉河即今龙罗河。向达《蛮书校注》载：“后来越析北徙至今丽江一带”，惟非北徙至丽江，见于记录之地名，甚为明白。盖么些族是从双舍地区渡泸而南至越析州，聚成部落，其势渐盛，既为南诏击败，又退回双舍，此后泸水以南无么些族居民了。

五、昆川、西爨的么些人

么些族居民，曾被南诏掳掠安置在昆川地区。樊绰《云南志》卷四载：“磨蛮（《新唐书》南诏传作么蛮些蛮），……南诏既袭破铁桥及昆池等诸城，凡虏万户，尽分隶昆川左右及西爨故地”。又卷六拓东城载：“贞元十年，南诏破西戎（吐蕃），迁施、顺、磨些诸种数万户以实其地”。按：《旧唐书》本纪：“贞元十年三月庚辰，南诏异牟寻攻破吐蕃铁桥已东城垒十六，擒其王三人，降其民众十多万口”。又樊绰《云南志》卷七昆明城载：“有大盐池，比陷吐蕃，贞元十年春，南诏收昆明城，今盐池属南诏”。《通鉴》：“贞元十一年十月（纪年月误），南诏攻吐蕃昆明城取之，又携施、顺二蛮王”。《新唐书》南诏传：“异牟寻攻吐蕃，复取昆明城以食盐池，因定磨些隶昆川（原误作昆山）西爨故地”。按：贞元十年正月五日，南诏异牟寻与唐使臣崔佐时盟于点苍山神祠，即出兵吐蕃，取铁桥以东城垒及昆明城，在这地区多为么些族所居，掳掠一万户人口安置在昆川，这是一次大量人口被迁移。昆川即昆州，在今滇池周围地区，迁到这个地区以后的事迹，不获知其详。惟南诏控制被征服的么些族人户，想来不使他们聚居，而是分散在西爨各地，后来融合于爨族，没有单一的么些族存在了。

《元史》地理志澄江路载：“初，么些蛮居之，后为爨蛮所夺，至段氏时，么些蛮之裔后居此甸，号罗伽部”；又阳宗县载：“昔么些蛮之裔居之，号曰强宗部”；又新兴州载：“段氏时，么些蛮分居其地”。此所谓么些蛮，是不是被南诏安置在西爨故地的么些族后裔而至大理段氏时期仍设为部呢？陶云逵的《关于么些之名称分布与迁徙》一文，是肯定的，他画唐、宋、元时代么些民族分布图，就在澄江、玉溪（新兴）注记么些居民的符号。但这是《元史》地理志的误字，并不可靠。《元史》地理志新兴州研和县载：“么些徒蛮步雄居之”，此称为“么些徒”；又澄江路江川县载：“至段氏，些么徒蛮之裔居此城，更名曰步雄部”，则么些徒为么些徒之误。又《元史》地理志在建水州、宁州并载：“些么徒蛮居之”；在晋宁州归化县、呈贡县、弥勒州、威楚路定远县并载：“些莫徒蛮居之”。凡《元史》地理志所载的些莫徒蛮、些么徒蛮，么些蛮、是同名异写，而么、些二字为倒误，不能从其误而认为大理段氏至元代在澄江、新兴还有么些族存在。

考《新唐书》两爨传载：“爨蛮之西有徙莫祗蛮，俭望蛮，贞观二十二年内属，以其地为傍、望、览、邱、求五州，隶郎州(今曲靖)都督府”。地理志诸蛮州所载同，《通鉴》亦载之。此徙莫祗，即《元史》地理志的些莫徒，《明一统志》卷八十六作撒摩都，亦作步门，《景泰云南志》卷四楚雄府载：“定远县之民，有曰撒摩都，即白罗罗之类”，明、清地方志书记载撒摩都，同音异字甚多，近代有作散民，自称撒马都，这就是唐初记录徙莫祗相传至今的名称，不能与么些族相混。

六、丽江、永宁地区的纳西族

么些族自定祚再向西迁至金沙江上游地带。樊绰《云南志》卷四载：“磨蛮，亦乌蛮种类也，铁桥上下及大婆、小婆、三探览、昆池等川，皆其所居之地”。又卷一载：“牦牛河，南流过铁桥上下么些部落，谓之磨些江”。按铁桥者，《樊志》卷六载：“铁桥城，在剑川北三日程，川中平路有驿，贞元十年，南诏异牟寻用军破东、西两城，斩断铁桥”。《元一统志》丽江路古迹载：“铁桥，在巨津州之北，其次有城，亦名铁桥城，吐蕃尝置铁桥节度于此。南诏异牟寻破吐蕃，断铁桥后，自此桥废，基址尚存”。正德《云南志》卷十一丽江府古迹载：“铁桥，在巨津州北一百三十余里，跨金沙江，异牟寻归唐，与韦皋合兵破吐蕃，断铁桥，即此桥。桥所跨处，穴石锢铁为之，遗址尚存，冬月水清，犹见铁环在焉”。按：铁桥遗址在今巨甸(巨津州城)北一天路程的塔城关，已不见铁环。^①自唐调露二年(公元六八〇年)，吐蕃向南发展势力，置神川都督于此，贞元十年(公元七九四年)南诏异牟寻破吐蕃于神川，收铁桥以东十六城垒，设铁桥节度，即包有今丽江、鹤庆、宁浪、永胜等县之地。《樊志》所说铁桥上下磨些部落，并不限于铁桥城上下，而是指铁桥节度地区，且铁桥城上下，沿金沙江两岸，崇山峭壁，可居之地不多，早期居民所选择的，当在较为广阔之地。铁桥上下，乃泛指铁桥节度区域。

在铁桥节度区域之内，么些族所居有大婆、小婆、三探览诸地，略作考说。《樊志》卷六载：“昆明城在东泸之西，去龙口十六程。正北有诃苴川。正南至松外城，又正南至龙怯河。西南至小婆城，又西南至大婆城。西北至三探览城，又西北至铁桥城”。按：此为昆明城(今盐源县)出发向正北、正南、西南、西北诸路的地名，即小婆、大婆为向西偏南的路线，三探览、铁桥城为向西偏北的路线。《樊志》又载：“宁北城，北地有魍川，又北有横川，又北有郎婆川，又北有桑川，即至铁桥城北九贲川”，此为自宁北城(今邓川)出发北至铁桥、九贲川(今巨甸)一路之地名。称为“川”即平坝，据地形释之，魍川在今牛街坝，横川在今松桂坝，郎婆川在今鹤庆坝，桑川在今丽江坝，此数地间相距并约一天多的路程。郎婆应在鹤庆，今纳西语称鹤庆为 $le + by + dy$ ，意即 $le + by$ 地，与郎婆川之音相近。疑郎婆即大婆，大婆城在今鹤庆坝也。《元史》地理志鹤庆路载：“昔隶越析诏”，即因昔为么些族所居。又《元史》地理志北胜府顺州载大婆、小婆地名，即因古为小婆地，顺州在今永胜城西，疑小婆城在今永胜地。与《樊志》所载昆明城(盐源县)西南至小婆城又西南至大婆城之

^①和按：一九七七年五月，我同丽江县文化馆赵德祥同志一起，到丽江塔城公社的 $t'a\ 1 dzæ\ 1$ 塔城村调查访问，经过同当地老人座谈后，由公社干部梁耀恒同志亲自带路，顺江往北，实地察看，传说中的铁桥遗址，在今塔城北四里许的金沙江边。江面不宽，江西还种有庄稼；遗址对面(江东)两个悬岩之间，有人可行走的狭长地带，直通高山。因年代久远，明显的铁桥遗迹，今已无存。

说相合。

又《樊志》之三探览，疑“三”下夺“賧”或“川”字，应作三賧、探览，为两地名。三賧者，《元一统志》丽江路通安州载：“州治三賧，亦曰样渠头賧”，《元史》地理志载：“通安州，昔名三賧”，按：样渠头，即今称 i+gɣ+dyɿ，（古音渠头为全浊，对音实相符）为丽江城区。又三賧疑即桑川之异写，今藏语犹称丽江为 sa+do+。又探览者，《元史》地理志丽江路永宁州载：“昔名楼头甸，地名答兰”，按：楼头，即今称 ly+dyɿ，为永宁城区，地名答兰即探览之异写。此三賧，探览在昆明城西北地区，与《樊志》所说相合。

上述大婆、小婆、三賧、探览并为铁桥节度所属，当即“异牟寻攻收吐蕃铁桥已东城垒十六”的几个重要地名，为么些族所居。而三賧、探览的么些部落，后来造成强大势力。《元史》地理志永宁州载：“接吐蕃东徼，么些蛮祖泥月乌逐出吐蕃，遂居此賧，世属大理，宪宗三年（公元一二五三年）其三十一世孙和字内附。（柯劭忞《新元史》地理志作三十三世，不详所据）又通安州载：“昔仆徧蛮所居，其后么些蛮叶古乍夺而有之，世隶大理，宪宗三年，其二十三世孙麦良内附”。按：元宪宗三年，忽必烈征大理，《元史》世祖本纪载：“至金沙江，乘革囊及木筏以渡，摩娑蛮主迎降”，即先至永宁、丽江，收服么些族土长。①这时，在这两个地区有么些族居民的年代不获知，其部族土长，永宁自泥月乌已传三十一世，通安州自叶古乍已传二十三世。以二十五年为一世计之，则泥月乌的时代在公元五世纪后期（当南朝齐、梁之际），得势于永宁，后二百年（当唐高宗时）叶古乍得势于通安（丽江坝）。在这个地区有么些族居民，应在公元五世纪、七世纪以前，后有土长造成势力，此可得而说者。

丽江《木氏宦谱》载：摩娑土长在定萑世为昆明总军官，传至叶古年凡十七世，续传至秋阳，“秋阳，高宗上元（公元六七四至六七六年）中，为三甸（三賧）总管”，按：叶古年即

①关于忽必烈征大理“革囊渡江”的路线，《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十七章“忽必烈征大理”载：“大约是由今盐源、永胜一路，而抵金沙江，然后，‘乘革囊及筏以渡’，到达今丽江县境”，所附“忽必烈进军大理路线图”（一〇四页），渡江处在今永胜和丽江之间的梓里渡口。这是毫无根据的臆说。按：《元史》地理志丽江路宝山州载：“世祖征大理，自卡头济江，由罗邦至罗寺，围大匱等寨，其酋内附，名其寨曰：察罕忽鲁罕”。万历《云南通志》卷四永宁府载：“元世祖驻日月和即此”（永宁）；又丽江府古迹大匱寨条，引《元史》地理志之说而加详，都认为忽必烈是由永宁过宝山到通安州（今丽江坝），这是确定无疑的。和按：一九七八年四月，我和丽江县文化馆李即善同志一起，经实地考察访问，进一步证实了“元跨革囊”的渡江口，就在今丽江市奉科公社的奉良渡口。该渡口纳西语称 gɣ+k'u+me+，即“大渡口”，“卡头”当是纳西语 gɣ+ku+dyɿ“渡江处”的音译；奉良渡口今天仍然是木里、永宁通往丽江的主要渡口。从渡口往上走五里许，至今还有两个 i+p'æ+lo+ 营盘村和 zua+bæ+tu+ 马箭道的地名，相传为元兵渡江后的驻地，今为奉科公社所在地。从奉科到宝山的必经路上，有一个大山谷，今天仍称 lo+ts'yɿ+lo+“蒙古谷”，意为蒙古人经过的山谷。从 lo+ts'yɿ+lo+ 往南到今奉科柳青，要爬一座高约四千公尺的雄威山关，称为“太子关”。“大匱寨”在太子关西南方向的金沙江边，即今大具公社所在地，纳西语称 da+gɣ+“大匱”显然是 da+gɣ+ 的音译。“察罕忽鲁罕”即蒙语，《火源洁华夷译语》：察罕为白，忽鲁罕为溪，意为白水，即今玉龙山麓著名的黑白水，是奉科、宝山、大具通往丽江的必经之地。可知，忽必烈进军路线，是经木里、永宁，从奉可渡江，过宝山（大具）、黑白水到丽江坝区，不是经盐源、永胜，在梓里渡江，这是很明确的。

叶古乍，疑“乍”字误。在公元七世纪，丽江之么些族已建立政权，所说可以近信。又《宦谱》载，秋阳之子阳音都各时，六诏并属南诏，乃服属于南诏，即为铁桥节度境内之土长。

《宦谱》又说：传至刺土俄均时，郑买嗣篡南诏位，（在天复二年，公元九〇二年）遂不服郑氏；又载：“刺土俄均生六子，各分部为诸夷之长”。盖在这时，丽江么些族社会，发展到新的阶段，土长的统治势力也加强。自此以后，当不断发展。

丽江所属各地，在元之前，已为么些族主要居住区域，《元史》地理志宝山州载：“昔么些蛮居之，其先自楼头徙居此，二十余世”；巨津州载：“么些大酋世居之”；临西县载：“居民皆么些二种蛮”；蒗渠州载：“罗落、么些三种蛮世居之”。在这几处以外，景泰《云南志》卷五兰州及鹤庆府并载：“境内多么些蛮”。又天启《滇志》卷三十载：“么些蛮，北胜、顺州亦皆有其类”，这也是在早期定居下来的。大抵，么些族迁至金沙江上游地带，数百年间，逐渐发展，成为大片分居。以今之丽江为中心，其四境：东与西蕃（普米族）、北与吐蕃（藏族）、西与怒江（傈僳族）、南与大理（白族）交错，社会经济文化不断发展，也被土长木氏利用造成势力，与邻境争夺。

七、公元十一世纪以来的历史发展

《木氏宦谱》载：“牟西牟磋，当宋仁宗至和（公元一〇五四——一〇五六），更立为摩娑大酋长，段氏虽盛，亦莫能有”。《明一统志》卷八十七丽江军民府载：“宋时为么些蛮酋蒙醋所据，大理莫能有”。按：蒙醋即牟磋之异写。（正德《云南志》卷十一及《明史》土司传作蒙醋，醋者误）到这时，么些土长称强于一隅。但蒙醋为诸部落大长，还不是有强力统治所属地区，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载：“末些蛮，负险酋寨星列，不相统摄”，惟元代以木氏大长为盟主的区域，设丽江路宣抚司，明代设丽江府。由于社会基础不断巩固，木氏势力亦渐强大，自明永乐以后，木氏直接统治宝山、巨津二州，（《土官底簿》载此两州土官，永乐以后不袭职，可以为证）从此，扩张势力区域，在其东境，与盐井卫所属么些土长争扰，《蜀中广记》卷三十四盐井卫土千户载：“所属五千户所，与丽江接壤，为所蚕食，不克自振，惟日事强无害而已”。又载：“左所土千户，地与永宁、丽江二府为邻，丽江土官木氏每来侵之，土地夷民失其半”，按：丽江、永宁土官与盐井卫土千户经常争夺，（《明史》姜昂传附姜龙传及永宁土司传略有记载）彭汝贤《六诏纪闻》，即纂录嘉靖十四年会勘左、前二所与永宁府争地的案牍。（刊入《金声玉振集》中）此为么些族内部的争夺。

丽江土长木氏与吐蕃争夺，随着政治势力的发展，么些族居民被迁徙安置在各地。余庆远《维西见闻录》载夷人说：“么些，即唐书所载么些兵是也。元籍丽江，明土知府木氏，攻取吐蕃六村、康普、叶枝、其宗、喇普地，屠其民，徙么些戍之，后渐蕃衍”。又自序说：“维西于唐为吐蕃东封。万历间，丽江土知府木氏寢强，日率么些兵攻吐蕃地，遂取各要害地，屠其民，而徙么些戍焉。自奔子栏以北番人惧，皆降。于是，自维西及中甸并现隶四川之巴塘、里塘，木氏皆有之，收其赋税，而以内附上闻”。按：《木氏宦谱》载自木崧（正统七年袭职）以下泰、定、公、高、东、旺、青、增（隆武二年，即顺治四年卒）的二百年中，得胜于忠甸、你那、鼠罗、你罗等十数地的战绩记载很多。在长江第一湾立一石鼓，（直径约四尺五寸，厚二尺）一面刻着嘉靖二十七年金紫主人（木公）所作“太平歌”和“破虏歌”，一面刻嘉靖四十年木高撰“大功大胜克捷记”，纪戊申、己酉两年在毛佉各

(在阿墩子北六站, 应在今梅岭山以北地区) 等处的战绩。木氏不断扩张势力, 迫使丽江居民迁往驻守, 巩固统治政权, 至晚明为盛。倪蜕《滇云历年传》卷十一康熙十年, 云南巡抚李天裕题奏载: “丽江土府, 元明时俱资以蔽蒙蕃, 后日渐强盛, 于金沙江外则中甸、里塘、巴塘等处, 江内则喇普、处旧、阿墩子等处, 直至江卡、拉三巴、东卡, 皆其自用兵力所辟”, 则木氏已统治昌都、巴塘、里塘以南地区。在这地区散居的么些村落很多。在一九五四年展开民族识别的调查, 有人提到纳西族在西康地区有五千户以上的居民, 但这地区的么些族, 大都与藏族融合, 有称为“么些古宗”如在阿墩子北边盐井县境, 清季还有么些村落, (见段鹏瑞《巴塘盐井乡土地志》自序) 现在已为藏族, 即中甸腹地的东旺, 原是么些村落, 现在已为藏族。又木里有丽江迁去的么些居民村落, 瑜在西昌时闻木里门功韩甲亚说: 已报为藏族了。所以丽江以北在早期居住着的么些族, 多已融合于其他族, 只在中甸属沿金沙江地区和维西境内, 还有许多么些族村落。

纳西族住在丽江地区的年代已久, 在这地区有很大的发展, 其居住区域之广, 以明代晚期为盛。自清初改土设流以来, 大量的民族融合, 即纳西族融合于其他族, 或其他族融合于纳西族, 变动很大。据一九五四年调查, 在丽江区纳西族居民有一十五万三千一百一十八人, 分布在丽江、中甸、维西、宁浪、永胜、剑川、德钦、福贡、贡山等县; 又分布在盐源、盐边、木里等地, 共为十六万多人。

上述自远古至近代纳西族迁徙和居住区域的情况, 瑜前写《么些民族考》一文, 刊于一九四四年出版的《民族学研究集刊》第四期, 大体汇集资料, 而错误甚多。兹略说渊源迁徙和居住区域, 可以了解这个民族在历史上分布的情况。至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 已有云南民族调查组编写的《纳西族简史简志合编》, 一九六三年内部铅印, 可供参考。

中国蒙古史学会在呼和浩特成立

中国蒙古史学会于1979年8月5日至12日在呼和浩特召开了成立大会。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同志周惠、廷懋、王铎、孔飞、王逸伦等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划局梅关桦同志参加了大会并接见了大会代表。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院长浩帆同志致开幕词, 孔飞同志, 梅关桦同志讲了话。参加这次大会的还有我国蒙古史学界的老前辈和来自全国各地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等的蒙古史学工作者一百二十多人。

这次大会, 是我国蒙古史学工作者的一次盛大的集会, 会上总结了三十年来蒙古史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今后二十年的研究任务和奋斗目标。会议期间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 与会者向大会提交了七十余篇学术论文。大会通过了《中国蒙古史学会章程》, 选出了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会, 理事长翁独健, 副理事长戈瓦(蒙古族)、韩儒林、黄静涛(蒙古族)、特布新(蒙古族)。中国蒙古史学会是一个专门研究蒙古史的群众性学术团体, 它的基本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专门和业余的蒙古史学工作者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 采取各种不同形式, 开展学术活动, 进行学术交流, 互通情报, 活跃蒙古史研究, 促进我国蒙古史研究的发展。

(蔡志纯供稿)